

当代台湾观察丛书

当代台湾

政治分析

刘国深 著



九州出版社

当代台湾政治分析

刘国深 著

九州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台湾政治分析/刘国深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2.6

ISBN 7-80114-773-1

I. 当... II. 刘... III. 政治—研究—台湾省 IV. 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0523 号

当代台湾政治分析

刘国深 著

出版: 九州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706017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35 千字

印张: 9. 625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书号: ISBN 7-80114-773-1/D·79

定价: 16.00 元

序 言

我刚从台湾回来，刘国深博士送来他的新著，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欣然同意。看完全书，我的感受和这次访问台湾的感受一样：要真正认识台湾，必须尽可能“贴近台湾”。

作为研究台湾的学者，主要以台湾为研究对象，对台湾的了解程度是决定研究水平、研究质量和研究结论的正确性的重要因素。靠什么来了解台湾呢？除了书刊、报纸以外，现在还有电子媒体，在资料上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了，其实不然，使用第二手资料必须花费不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这往往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判断，未必可靠。如果能够获取第一手资料，可靠性就强多了。毛泽东提倡“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话没有过时，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强调“实地观察”和“参与观察”，都是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很羡慕研究祖国大陆的台湾学者，他们可以经常前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任凭他们驰骋，他们掌握祖国大陆第一手资料的机会比我们之于台湾要多得多。研究台湾的祖国大陆学者如果能够经常进入台湾，深入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和各阶层民众的不同心态，那么认识台湾的程度一定比现在强，更比没有从事调查访问的人要强得多。

本书作者平时注意接触台湾各界人士，并曾数次赴台，还在台湾一所研究机构做过一个月的专题研究，调查访问了许多学术界、政治界、企业界人士和一般民众，可以明显地看出，本书有许多资料不是从书刊文献上获取的。因此，作者的许多看法都是“自己的”，这和在台湾海峡此岸作远距离的观察有显然的差别。作者把自己对台湾的观察和认识毫无保留地提供给读者共享，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祖国大陆同胞正确地、准确地了解台湾、认识

台湾，从而对当代台湾政治做出正确的判断。

看过全书，本来可以就本书的具体内容发表一些看法，但考虑到写书评不是写序的任务，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不过，我不得不说，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篇，即政治文化篇：当代台湾政治心理。作者通过历史的现实的考察，对当代台湾人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文化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你可以看到台湾人对“中国”“大陆”“台湾”是怎么看的，台湾人为什么会有“悲情意识”，台湾人对美国、日本的想法为什么和祖国大陆不同，“族群意识”为什么在台湾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对“中华民国”和台湾前途有什么样的看法等等。作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

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作者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不得不考虑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确有道理，或有几分可以接受，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不得不考虑要怎样才能进行有理有力的反驳。我想，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即由本书引发争议和讨论，使我们对台湾的认识更加深入，那也可以算是本书的另一种“效益”了。

本书是祖国大陆学者对当代台湾政治分析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由一位青年学者完成这项任务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的，而二十年来祖国大陆对台湾的研究才走到这一步，却显得过于迟缓，但愿本书的出版可以激发更多青年学者的研究热情，发表更多优秀的著作，使我们能够更加“贴近台湾”，认识台湾，促进祖国大陆深入了解台湾，也促进台湾深入了解祖国大陆，这样，两岸就会走得更近了。

陈孔立

2001年9月6日



刘国深

1964年生于福建龙岩市。1982年以来陆续获得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9年7月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任政治研究室主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已发表《民进党的世俗化趋势及其困境》、《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等学术论文70多篇，参与编撰《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研究》等著作五部。

目 录

本书基调	(1)
研究起讫	(4)
海内外研究现状	(7)
理论与分析框架	(12)
主要问题与结构安排	(16)

政治文化篇：当代台湾政治心理

第一章 台湾人的政治认知	(24)
第一节 台湾人对中国政治的认知	(29)
第二节 台湾人对大陆政治的认知	(31)
第三节 台湾人对台湾政治的认知	(32)
第二章 台湾人的政治情感	(36)
第一节 “叛逆”心理	(37)
第二节 “悲情意识”	(40)
第三节 “恐共心理”	(41)
第四节 “媚日崇美”现象	(43)
第三章 台湾人的政治价值取向	(46)
第一节 “政治革新”前的政治价值取向	(46)
第二节 当代台湾政治价值取向	(48)
第四章 当代台湾政治文化五大迷思	(52)
第一节 政治信仰“欧美化”	(52)
第二节 族群意识“褊狭化”	(55)
第三节 政治文化脱“中国化”	(63)

第四节 国家认同“异质化”	(73)
第五节 台湾前途“自立化”	(85)
第五章 当代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原因	(93)

政治结构篇：当代台湾政治系统

第六章 “中央政府”结构	(107)
第一节 “政治革新”前的“中央政府”概貌	(108)
第二节 当代台湾“中央政府”结构	(121)
第七章 “地方政府”结构	(132)
第一节 “政治革新”前的“地方政府”结构	(133)
第二节 当代台湾“地方政府”结构	(140)
第八章 阶级阶层结构	(144)
第一节 “政治革新”前的阶级阶层结构	(145)
第二节 当代台湾阶级阶层结构	(147)
第九章 政党政治结构	(151)
第一节 “政治革新”前的政党政治结构	(151)
第二节 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结构	(152)
第十章 利益集团结构	(167)
第一节 “政治革新”前的利益集团结构	(168)
第二节 当代台湾利益集团结构	(170)
第十一章 台湾政治结构变迁原因	(179)

政治行为篇：当代台湾政治过程与政策

第十二章 “政治革新”前的政治过程与政策概貌	(192)
第一节 政治过程概貌	(192)
第二节 内“外”政策概貌	(198)
第十三章 当代台湾政治过程	(203)
第一节 利益表达	(204)

第二节	利益综合	(211)
第三节	精英甄补	(213)
第四节	决策体制	(218)
第五节	政治社会化	(227)
第十四章	当代台湾公共政策	(229)
第一节	岛内政策	(229)
第二节	大陆政策	(238)
第三节	“对外政策”	(258)
第十五章	当代台湾政治过程与政策变迁原因	(265)
结语	当代台湾政治批判与前瞻	(275)
第一节	台湾政治变迁的动力：必然与应然	(277)
第二节	台湾政治变迁的模式：迷失与危机	(281)
第三节	台湾政治变迁的前景：张力与极限	(286)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300)

本书基调

尊敬的读者，在您进入《当代台湾政治分析》正文之前，恭请参考作者以下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既是本书立论的基础，也是从学术角度就当代台湾政治问题进行理性讨论的必要前提。

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与祖国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社会。“台湾人”就是生活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台湾人和大陆人的人民一体性不可否认。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不仅体现在现实的法理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两岸的历史文化之中。根据作者多次进入台湾地区的实地考察发现：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分离，今天的台湾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社会，台湾文化的“中国性”与祖国大陆是相同的。甚至，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化遗产在某些方面比经历过“文革浩劫”后的祖国大陆许多地区保留得更加传统而且完整。

第二，两岸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政治国家”和“政治世界”的问题。古希腊政治学泰斗亚里斯多德的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必须过城邦生活。这一思想至今仍是普世公认的准则，人类社会尚未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境界。国际社会依然处在“政治的时代”，“政治国家”是构成“政治世界”的基本单位，也是各个国际单位内部“最高的善”和“必要之恶”。在“政治世界”里，国家边界、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仍然是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国家主权和领土的统一完整不可分割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基本准则。海峡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内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了各自的局部利益外还有整体利益。

第三，从两岸关系来看，“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残局关系至今尚未在政治上、法理上彻底终结。两岸政治社会的一体性源自悠久的历史传承，无论岛内政局如何变化，两岸政治对立

的残局关系性质并没有改变。如果否认两岸关系的政治历史，否认两岸同属一个政治国家的现实，我们将无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当然，如果无视百年来两岸分多于合的历史，无视两岸政治社会存在明显差异的现实，我们就无法实事求是地构筑双方均可接受的统一途径和模式。

第四，两岸中国人应该换位思考双方关系问题。两岸长期分离的结果，使祖国大陆与台湾成为两个相对自立的政治体系，如果双方不能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深入了解对方的政治认知、情感、利益、价值取向，我们就难以把握两岸政治关系的规律性，就不可能找出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途径。对于祖国大陆的学者来说，台湾政治体系内部的政经社会关系是当代台湾政治变迁的主因，祖国大陆因素是“相对外因”，而国际因素才是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真正的外部因素。我们必须努力寻找台湾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作者将努力尝试以台湾人的眼光去观察，设身处地地用台湾人的心情去感受当代台湾政治问题。然后，站在中国人整体利益的“思想平台”上来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

根据政治系统论中有关政治系统分层的理论，台湾政治体系可以视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次体系。因此，台湾政治研究属于整体的中国政治研究的一部分，或“地区性政治研究”。台湾政治次体系的发展演变是整体中国政治体系发展演变的一部分，台湾政治体系与中国政治体系内部其他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台湾地区的政治形态及其内涵具有东西方政治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与祖国大陆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加强当代台湾政治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台湾政治现象，而且将促进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区域政治问题研究；同时，本研究也可以作为政治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具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分析案例。

自 1895 年以来，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分离多于聚合，特别

是 1949 年以来，两岸长时间处于敌对状态之中，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因此受到极大的制约。如何早日结束敌对，实现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和人民团结，始终是一个困扰着两岸中国人的极大难题。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既有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也有客观存在的两岸政治、经济、社会现实等差异性因素。虽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空环境中作用力各不相同，但总体上说，最棘手的因素既非外国势力的干预，也不是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而是两岸政治上的差异性。两岸政治体系同为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政治上的共性不仅体现在主权、领土、人民的一体性上，而且深藏在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政治文化之中。因此，笔者认为，政治文化上的“中国属性”仍然是当前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绝大多数台湾人内心深处的“中国烙印”仍然没变，台湾社会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这是理性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任何以政治上的特殊性或局部异化现象否定台湾政治社会的中国性格的认识都是片面的。然而，我们也无需回避，经过一百多年来的相对自主发展，台湾社会已经在某些方面发展出与祖国大陆社会不同的区域特性，虽然这一特性相较于台湾政治主体上的中国性来说仍是表面化的或局部性的，但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形来看，受到特殊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一表面的局部特性的影响力却相当惊人。由于政治力的不当介入，两岸政治上的共性往往遭到曲解甚至人为掩盖，两岸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安全、尊严一致性价值被刻意地边缘化，在双方之间相互敌对的逻辑下，政治上的差异性取代一致性，成为两岸关系互动中直接产生作用的显性因素，这种差异性构成了近 20 年来两岸关系互动的主要环境背景。

两岸政治上的差异性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国共内战”残局关系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其次，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差异；第三，近代以来台湾特殊的历

史经验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第四，近 50 年来两岸自成体系的发展历程是造成两岸政治差异的直接因素。如果不了解彼此间在认知、情感、价值体系方面的差异性，不了解彼此间在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方面的差异性，两岸双方就很难相互理解并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共识，更遑论说服对方、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措施，猜忌、误判乃至敌意也就不可避免。

对于台湾政治的变迁，笔者将尽力秉持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全面、辩证地加以评析，如果涉及价值判断，也将顾及台湾人民的利益要求、以两岸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消长为月旦臧否之依归。作者反对以外在的环境逻辑作为观察台湾政治过程的标准，主张从台湾内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台湾的政治变迁，外部环境只是台湾政治发展变化次要的、外在的因素。同时，作者主张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台湾的政治现象。

研究起讫

有关当代台湾政治研究的起讫与分期问题，学术界尚无定见。笔者认为，1986 年 3 月的“政治革新”是战后台湾政治发展历史性的转折点。因此，本书选定 1986 年 3 月的“政治革新”为“当代台湾”的断代起点。回顾战后台湾政治演变的历史，在 1986 年以前的大约 40 年间，国民党政权的威权统治形式基本维持不变，从上到下的政治过程都是在国民党当局一元化主宰下展开的，形式上的公职选举实质上只是专制统治“合法化”制式化过程而已。民间社会的力量根本难以突破国民党政治系统的封闭体制，反倒被专制体制利用了。

但是，从 1986 年 3 月底国民党推动“政治革新”起，台湾政治体系开始发生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从当月 29 日起，国民党中央召开了连续三天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蒋经国的强力主

导下，国民党当局主动提出了“政治革新”构想，并立即成立了“政治革新 12 人小组”，负责制定具体的“政治革新”内容。1986 年 6 月，国民党“政治革新 12 人小组”进一步提出“政治革新六项议题”：第一，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第二，地方自治法制化；第三，制定“国家安全法”；第四，制定民间团体组织法；第五，强化社会治安；第六，党务革新。回顾 15 年来的当代台湾政治演变过程，“政治革新”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政治革新”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是战后台湾政治环境变迁下的必然结果。80 年代中期，台湾经济、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人心思变。表现在，第一，私有经济的发展向既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提出变革要求。由于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民间资本快速发展，垄断经营的“国营事业”角色地位受到强烈的挑战，从 1984 年起，台湾当局被迫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这一年当局大幅度降低了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表现为外汇管制大部分解除、进口关税大幅降低、进口的非关税障碍减少^[1]。经济上的转型同时也对政治上的改革提出相应的要求，打破垄断独裁的“党国体制”，建立与市场法则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呼声越来越大；第二，“中华民国”政治地位的边缘化和岛内经济转型的迟滞，使台湾社会弥漫着严重的“信心危机”。1980 年代初，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刺激下，不仅经济领域展现出勃勃生机，而且在政治上也赢得了国际社会一边倒的支持。相比之下，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却都明显呈现暮气沉沉的景象。1985 年 9 月 20 日，“立委”林联辉在“立法院”质询中指出：“总结一年多来，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全国民众心中充满一股郁闷之气氛，各行各业中也弥漫着茫然的气息，这种郁闷、茫然的現象，充分暴露出全国人民患着严重‘信心贫乏症’的心态。其明显的症状是，对现状毫无把握，对未来充满怀疑，如果不适时制止，任其恶化，

最后必将演变为‘信心危机’，导致社会结构解体，形成不堪收拾的局面。”^[2]不少人因此将妻子儿女送到国外。时任“立委”的许张爱廉分析道：“国人心理的困顿、教育的困顿、经济的困顿，终形成社会的困顿。”^[3]

除了来自经济社会层面的压力外，台湾政治层面本身也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表现在，第一，绝大多数选自大陆地区的、代表“中华民国法统”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老成凋谢，“国会”面临非全面改选难以为继的困境；第二，蒋经国身患重疾，国民党政权面临接班问题；第三，本土成长起来的国民党新一代政治人物与外省籍老一辈政客之间的政治裂痕有急剧扩大的现象；第四，“党外反对势力”对要求放弃“戒严体制”，回归“民主宪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开放言论出版自由权和集会结社自由权的压力越来越大。^[4]

“政治革新”计划的施行，犹如推倒了台湾传统政治体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国民党专制独裁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最终走向垮台，“政治革新”政策居功厥伟。从1986年春开始，台湾人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台湾社会的政治构架、政治制度、实际政治运作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0年代末和整个1990年代的台湾政治变迁，都必须溯源到“政治革新”计划的推动。因此，系统地分析和研究“政治革新”以来的当代台湾政治变迁，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台湾政治发展的主线；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为何号称拥有250万党员的国民党会败在只有10多万党员的民进党人手上；同样地，这一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准确把握台湾政治的未来走向。所以，彻底解构1986年3月以来的台湾政治发展逻辑，将是本书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

海内外研究现状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祖国大陆，系统性的台湾政治学术研究热潮兴起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几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现象是：台湾岛内的台湾政治研究开始触及威权体制的结构面和基本价值体系；第一个专门的台湾研究学术机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在祖国大陆成立；随着韩国和菲律宾专制政权的崩溃，国民党政权独裁体制的出路问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 岛内的研究状况：

岛内零星的台湾政治研究起步于 70 年代初，但完整意义上的台湾政治学术研究直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才出现。

从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1970 年以前，台湾地区的政治学研究题材多局限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或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研究，而对于岛内政治运作，甚至基本制度都很少有人研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在虚幻的“大中国法统”心态下，“台湾政治研究”难登大雅之堂是可想而知的，舍“中华民国”而以“台湾”作为研究主体很容易被扣上沉重的政治帽子；二是台湾当局不愿看到学术界对“中华民国政治”的批评，学术界不得不避开敏感的政治现实问题。根据台湾学者倪炎元 1989 年发表的研究结论：“迁台后的中华民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政治研究’，而没有‘台湾政治研究’，能够合法以繁体中文撰写台湾政治研究论文，而不会遭受‘混淆视听’或‘丑化政府’指控，严格来说只是近十多年的事。”^[5]因此，这一时期我们几乎看不到“台湾政治研究”的学术成果。

70 年代以后，受到日渐增多的留美学成回台人士的影响，台湾政治学界开始大量引进行为主义政治学，介绍西方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等概念，由此，部分台湾政治学者开始用一些社会

学的方法从事台湾政治实证研究。如，袁颂西的《儿童与政治：台北市国校儿童政治态度之研究》（1970年），陈义彦的《台湾地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之研究》（1978年），江炳伦的《台湾地区人民政治文化与投票指向之研究》（1972年），庄锦农的《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1977年），蔡启清的《大众传播媒体对投票行为的影响》（1981年）等。从这些研究的内容来看，虽然大多回避敏感的政治结构、决策过程研究，只是局限在民间社会层次的“政治文化”、“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等层面的研究（如民众政治态度、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公共政策），但真正意义上的台湾政治研究已悄然起步。

1980年前后，台湾学术界的台湾政治研究开始由民间政治领域扩展到台湾威权体制的研究，研究的内容逐渐触及“国家结构”、“政府政策”以及官方政治哲学层次。如，在研究的方法方面，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仍然流行的同时，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获人们青睐。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86年以后，一种源自新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民间社会理论”成为台湾政治社会学领域相当热门的话题，其代表人物有南方朔、萧新煌等。他们认为社会内的宰制关系不只有阶级，还有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宰制关系，如性别、种族等。因此，如果要从事社会改革或达到社会民主，不只要就阶级关系，也要就其他关系来探讨。实际上，民间社会理论反对的只是“阶级化约论”，而不反对阶级研究。他们认为当前的台湾社会，省籍矛盾相当突出，其中当然有阶级因素在内，但并不等同于阶级矛盾。不管怎样，民间社会理论的确在台湾政治社会造成相当大的震撼，社会运动、社团化火上浇油，从结果上看，这股风潮不是推翻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王国，而是摧毁了传统官僚集团的统治基础。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政治钳制力的逐渐弱化，加